

中美安全政治关系的可能走向

刘永涛

(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摘要] 探讨两个大国未来安全政治关系走向,一个可能的途径是将这两个国家放在一定的体系层面加以考察,因为这种考察有可能从宏观上揭示它们在安全政治关系中的基本情形。本文把体系层面研究的物质视角和文化视角结合起来,想象未来亚太地区国际体系中可能出现的五种格局,然后把中美安全政治放在其中加以理解。本文假定,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不同的国际体系格局里将具有不同的社会身份,而这类不同的社会身份,有可能决定着它们如何看待彼此在物质实力方面发生变化所具有的含义,从而使双边的安全政治关系具有不同的特征。

[关键词] 中美安全政治 国际体系 物质实力 社会身份

[中图分类号] D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89(2007)01-0011-008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及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随着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在冷战后所经历的重大变化,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交往变得更为密切,也更为错综复杂。它们之间的关系——尤其在安全政治领域的情形——再度成为引人关注的重点。本文拟就 21 世纪两国安全政治的可能走向进行探索,勾勒出几幅相对清晰的中美安全政治关系在 21 世纪可能走向的画面。人们对这些画面进行理性的筛选和取舍,有可能为建构一种最符合两国长远及根本利益的安全政治关系提供一种模式。

一、两种视角

探讨两个大国未来安全政治关系走向,一个可能的途径是将这两个国家放在一定的体系层面加以考察,从宏观上揭示它们在安全政治关系中的基本情形。就体系层面研究而言,目前大体存在着两种主要的分析视角。一种是强调实力分配的物质论,它是一种相对传统、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角,认为国家之间安全政治关系的性质,主要是由这些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权力地位来确定的。另一种是近年来开始逐渐引人注目、强调社会身份及观念分配为主的文化视角,它更多地关注国家之间安全政治关系的性质如何受制于这些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具有的社会关系。这两种视角分别指出了国际体系物质结构及社会环境作为影响国家之间安全政治关系的重要因素。本文把体系层面研究的物质视角和文化视角结合起来,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想象未来亚太地区国际体系中可能出现的几种格局,然后把中美安全政治关系的走向放在其中加以理解。本文假定,亚太地区国际体系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的建构;在不同的亚太地区国际体系格局里,中美两国将具有

[收稿日期] 2006-09-20

[作者简介] 刘永涛(1957—),男,湖北武汉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博士。

* 本文是吴心伯教授主持的上海市曙光项目“中美安全关系走向之研究”的部分成果。

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现实主义尤其新现实主义意识形态是这一视角的主要倡导者。

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所出现的批评理论、建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提醒人们关注和重视各种社会力量及文化因素对世界政治及国际安全所构成的影响。

不同的社会身份,而这类不同的社会身份,有可能决定着它们如何看待彼此在物质实力方面发生变化所带来的含义,从而使双边的安全政治关系在不同的格局里具有不同的特征。

从物质的角度去观察国际体系,它曾经是国际政治研究中长期占支配地位的一种视角。尽管这种视角存在着不同的分支,甚至彼此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是,持这种视角的人对国际政治的性质有以下三个基本共识:

第一,国家是国际政治中最为主要的行为体,而且是在一定领土范围内合法使用武力的行为体。主权意味着国家行为体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去制订和实施国内法律。只有确立了安全,国内的社会、文化和艺术等才能够得以生存和繁荣。安全的确立依赖于物质实力,因此,国家的首要考虑是对物质实力进行组织、安排和管理。从根本上讲,每个国家都是一个以物质实力加以定义的权力国家,国际关系乃是国家之间的物质关系。

第二,由于在国家层面之上缺乏任何共同的权威,因此,无政府状态乃是国际政治生活中的显著特征。国家必须依赖自身的手段去保护自我安全和利益,即国家应该奉行自助原则。处于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竞争乃至敌对的关系。国家趋于凭借威胁使用武力或实际使用武力去实现自我在国际政治中的目标。它意味着,在国际政治中,始终存在着使用暴力的可能性。

第三,国家之间尤其大国之间物质实力的分配,是造成国际体系稳定或变化的最重要原因。尽管国家层面的因素诸如政体类型、国内政治特征或领导人的能力等很重要,但是,国际体系的物质结构决定着处于这种结构中各国的行为以及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的性质。

不过,在怎样的物质实力分配最符合国际体系稳定方面,物质论内部存在着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国际政治中最理想的实力分配状态是存在着两极力量。其他国家分别选择并依附于两极中的一极,造成两极平衡。出现单极或多极则意味着权力平衡的结束。当一个国家的力量超过其他国家力量时,其他国家的力量便会联合起来抗衡该国的力量,使其保持平衡^[1]。另一种观点则是所谓霸权稳定论。它强调某个单一霸权国家,凭自身占优势的权力并从自我长远利益出发,对世界经济及全球事务进行领导,并由此创设和管理着一种稳定的政治秩序^[2]。

体系层面研究的另一种主要分析视角,则强调了体系中的诸社会因素。它是一种文化视角,并从本体论上就国际体系的性质提出三个基本假设。第一,国际体系分别由物质结构和社会结构所构成,社会因素从根本上讲影响并决定着该体系中物质结构的含义。具体地说,一定体系中的国家实力以及实力分配只有在该体系的社会环境里才具有含义。譬如,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含义取决于这个国家在身份上是敌人、竞争者还是朋友。第二,一定的社会结构帮助构成国家的利益和身份,因此,在一定的体系中,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是竞争者、敌对者,也可以是朋友。第三,国家和它们所处的体系之间彼此存在着社会建构的关系^[3]。

这两种视角分别抓住了国际体系中影响国家之间关系的两个核心要素,即物质实力和社会身份。国际政治不仅是关于国家实力以及实力分配的场所,而且还是有关国家之间观念及价值分配的场所。但是,物质论忽视并低估了国际政治所处的社会环境,存在着明显的狭隘性和片面性,而且,霸权稳定论更是带有为霸权国家利益服务的倾向。文化视角则提醒人们,国家与国家之间不仅仅是物质的关系,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因此,如果把这两种视角加以联姻,它将从理论上为人们分析一定环境下的国际政治提供一种综合性的物质—文化视角,这种综合视角有可能使人们对特定体系中一定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解更加接近于“真实”。不仅如此,在方法论上,它也为人们同时利用因果分析和诠释说明的手段去理解这种关系提供了可能性。

有关物质视角的文献,可参阅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和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二、五种基本格局

亚太地区是当代国际政治的一个主要场所。除了欧盟以外,人们常称的“一超多强”在地缘上均处于这个地区:全球性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全球性大国俄罗斯、日本和中国。此外,该地区还有像印度、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区大国,也有像东南亚联盟和美日联盟之类的权力集团。在全球正式宣布拥有核武器国家的七个国家中,除英国和法国之外,其余五个国家均处于这个地区。此外,该地区目前还存在着谋求发展核武器的潜在国家。这些国家和权力集团不仅在亚太地区国际体系物质实力分配中处于不同的地位,而且在该体系里彼此处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处于这种体系下的中美关系,构成亚太地区 21 世纪安全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借鉴国际体系模式假设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把未来亚太地区的国际体系想象为可能出现五种不同的格局,并以可能对中美安全政治关系最为不利到可能最为有利作为先后顺序,对其加以叙述。

第一种是两极格局。它是经过两极平衡途径而实现的地区秩序。在这种格局里,由于再度出现两个超级大国,亚太地区有可能成为新的两极对抗的场所。在这种格局里,美国被认为继续保持着超级大国地位。作为另一极的超级大国则有几个候选人:俄罗斯、日本和中国。历史上的俄国曾在国际政治中不止一次地经受过挫败,但后来均东山再起;此外,现在的俄罗斯仍然保留着超级大国的一些特征,如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拥有核武器及核技术、空间技术、科技潜力、能源资源,以及享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等。因此,俄罗斯谋求恢复冷战时期苏联在国际政治中所具有的那种军事政治权力地位是可能的,只是目前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使得它无法在短期内实现这个目标。日本是一个全球性经济大国,但是它的狭窄地理以及有限的资源,尤其在历史问题上的狭隘心理,严重地妨碍它获得超级大国地位所需具备的自然资源和政治气质。于是,在一些人看来,中国似乎更具备成为超级大国所需的条件。类似于冷战时期那样,这种两极格局通过超级大国彼此对抗,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地区秩序。在这个过程中,占支配地位的两个超级大国将发展出一套规定和约束各自行为以及它们各自集团成员行为的规范。在这种格局里,该地区的其它国家和权力集团,不得不再次就跟随两极中的哪一极做出选择。

第二种是霸权格局。它是经过某个单一超级大国的霸权途径而实现的地区秩序。在这种格局里,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主要依赖于占支配地位的超级大国所具备的能力和行为。美国被假定继续作为这种格局里的唯一超级大国,因为它被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会继续比亚太地区任何其它国家或权力集团拥有更多的物质实力及价值资源。美国通过积极卷入该地区的各种事务,阻止该地区其它国家或权力集团对现存地区秩序发出挑战,或者阻止它们谋求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展开竞争;防止和处理地区冲突以确保相关国家的安全,确保该地区以美国为主导的安全秩序得到维持。在这种格局里,其它国家或权力集团则需要采取听从的态度,接受霸权国家的治理。

本文所借鉴的有关未来国际体系模式假设的研究成果有:孔秉德和郑宇硕:《展望 21 世纪的中美关系:地区安全、贸易与资讯,以及文化交流》,载郑宇硕和孔秉德编:《1997 - 1998 峰会后中美关系之发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 年);Michael Mastanduro:“The U. S. - Japan Alliance and Models of Regional Security Order”,in G. John Ikenberry and Takashi Inoguchi (eds.): *Reinventing the Alliance: U. S. - Japan Security Partnership in an Era of Change* (Macmillan, 2003); Barry Buz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Lit., 2004)。

在一些西方人看来,如果中国沿着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崛起”,那么,中国将是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候选人,并对亚太地区安全环境产生重要影响,见 Denny Roy:“Hegemony on the Horizon? China's Threat to East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1), 1994, pp. 149 - 162; Robert S. Ross:“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4), 1999, pp. 81 - 118; David Wilinson:“Unipolarity Without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2), 1999, pp. 141 - 172; Barry Buz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Lit., 2004), pp. 71, 113 - 116。

第三种是权力平衡格局。它是一种经过多边权力均势途径而实现的地区秩序。在这种格局里,亚太地区国际体系不再由超级大国(单极或两极)所支配。这种格局的出现至少依赖于两个条件:一是美国的综合实力逐渐衰落,最终放弃或丧失充当唯一超级大国的角色。另一个条件是,在该地区,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充当超级大国或愿意接替美国的地位,而是满足于做一个全球性或地区性大国。于是,在不存在超级大国的情况下,国与国之间的权力关系更加趋于相互制衡。在这种格局下,该地区的主要国家很有可能是:一个仍然积极但实力被严重削弱的美国、一个重新崛起的中国、一个复苏过来的俄罗斯、一个得到重新定位的日本,以及在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均具有重要影响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这种权力平衡格局,类似于所谓的“多极”格局。

第四种是安全共同体格局。它是一种经过多边安全努力途径而实现的地区秩序。安全共同体作为一种确保地区安全秩序的机制,分别从理念和实践上超越了传统的权力均势概念。在一个想象的亚太安全共同体里,国家之间彼此分享着安全战略目标及利益安排;分享着规范、价值乃至安全政治话语。它使通过暴力手段解决国家之间冲突的想法和做法降至最低限度。在这种格局里,今天的欧洲被认为是明日的亚洲。在这里,亚太地区安全秩序是通过在该地区所确立起来的规范及合法的地区机制来维持的。因此,人们期待着诸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以及上海合作组织之类的机构,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以便在地区经济及安全事务方面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而不是逐渐被弱化或边缘化。

第五种是中美战略联盟格局。它是经过中美双方结成战略伙伴关系途径而实现的地区秩序。在这种格局里,美国在亚太地区重新选择自己的战略伙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单一支配角色,转变为由中美双方“共同治理”的政治安排。中美两国在该地区的经济、金融和军事资源等方面共同发挥主导作用。亚太地区秩序经过中美两国分享责任的安排而得到维持,其稳定的程度依赖于中美在对外政策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手段方面达成共识的程度。

三、不同格局下的中美关系

下面把未来中美安全政治关系的走向,放在上述五种可能的格局里加以理解。

在第一种格局里,亚洲重新出现一种两极的情形。如果接受关于在新的两极格局里冷战时期苏联的地位将由崛起的中国所取代的推测,那么,根据物质论视角,两个超级大国在物质实力上将相互对抗,彼此构成敌对(至少是竞争)的关系。其它国家和权力集团以意识形态作为标准,在中美之间做出“搭谁的车”的选择。一场两极格局下的军备竞赛在亚太地区可能重新出现。这种格局有可能造成以下两种情形中的一种情形发生:中美之间发生冷战或热战;中美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敌对关系。不过,根据文化视角,这种格局是否一定会把亚太地区重新拖回到冷战时代是有疑问的。首先,未来的中国不会是过去的苏联。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不再在全球范围内倡导把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方向;也不再支持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反政府武装力量,或向它们输出“游击战争”概念。其次,中国正在鼓励市场经济,加强竞争的市场机制,分享自由贸易理念。中美之间在经济、社会领域乃至在国际事务方面分享的价值逐渐增多。因此,如果中美两国在观念和价值方面能够更多地相互分享认识和看法,那么,它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可能是竞争者,而不一定是敌对者,因此,它们彼此之间的物质实力在含义上也将不同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情形。

在第二种格局里,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着霸权角色。从目前来看,当今亚太地区国际体系在特征上显然接近于这种格局。根据物质论观点,亚太地区的其它国家和权力集团将对美国的唯一超

有研究者对这种格局下的大国心理进行了有趣的分析,见 Barry Buz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Lit., 2004), pp. 132 - 146.

对安全共同体的概念以及经验上的较为系统探讨,可参见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级大国力量加以制衡,以确保该地区在物质实力分配上的相对平衡。因此,像俄罗斯、日本、印度和中国等国家作为主要的抗衡者,会从言语和行动上表现出不愿意接受以美国为中心对该地区秩序做出的某些安排。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和美国是竞争者关系,它们之间的争夺表现在不同的方面,包括市场、资本、资源、劳动力、投资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在外交上的紧张关系在什么时候都可能出现。竞争是经常性的,有时是严重的,甚至会发展为对抗。如果采纳文化的视角,本文既赞成关于在这种格局里存在着对霸权力量构成抗衡力量的观点,但同时认为,如果把社会身份因素引入这种分析,那么,日本(以及美国在亚洲的其它盟国)、印度等国家有可能是这种格局里美国霸权的追随者和依附者,而并非总是抗衡者,因为它们与美国分享着一定的民主价值和政治理念。不仅如此,它们甚至会听从美国安排而充当抗衡俄罗斯和中国力量的帮手,就像人们现在时常所看到的情形那样。根据这种视角,该格局下的中美关系取决于两国彼此如何看待对方的社会身份。只要中美之间在全球事务中分享的价值和理念逐渐增多,而且只要中国明确表示不挑战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利益,那么,它们的社会关系可以是竞争者加朋友的关系。

在第三种格局里,中国、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实力在亚太地区得到相对平均的分配,彼此之间构成权力抗衡者关系。按照物质论的看法,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因此,权力平衡格局下的中美两国会在一些地区安全和外交问题上寻求合作,不过这种双边合作是有选择的,受时间和具体事务的影响,而不是呈制度化或规律性。此外,中美两国会追求并实施彼此平行的政策,更加注重利用多边场合/论坛经常保持磋商和协调。双方会更多地通过沟通和对话方式避免使彼此的分歧扩大。在这种格局下,中美之间的社会关系仍然是重要的,但是由于中美两国物质实力相当,因此,这时两国社会关系的性质给其物质关系所造成的含义,没有像在第一种和第二种格局里那样敏感和突出。

在第四种格局里,多边安全共同体成为决定和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物质论视角一直对多边安全共同体话题不以为然,认为国家之间关系的性质主要是由利益和实力所决定,并非取决于是否分享所谓集体价值和观念。根据文化视角,本文认为,多边安全共同体仍然是未来亚太地区理想安全政治构架的一种可选途径。安全共同体内诸成员由于彼此分享价值和规范,它们的利益和行为变得可期待和相对透明。它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一种朋友关系,而不是敌人或竞争者关系。它们的各自物质实力成为共同体内集体实力的一部分。不过,有必要考虑到这种格局里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情形,它们对中美关系构成不同的影响。一种情形是中美两国都是该共同体的成员,它对中美关系构成良性的影响。另一种情形是由美国发起并把中国排除在外(或者由中国发起并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地区安全共同体。如果是后种情形的话,它将对中美关系构成不良影响。

在第五种格局里,中美两国结成战略伙伴,成为盟友关系,在广泛(而不是局部)的领域形成联合态势,并且有可能在抵制共同威胁方面从战略上采取高度一致的防御努力。无论是从物质视角还是从文化视角看,这种格局为中美两国建立了广泛的正式及非正式交流平台。这一格局下的中美关系是深入的、紧密的和持久的。这种关系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由于两国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身份上表现为“战略伙伴”和“盟友”,因此,双方对彼此物质实力的变化以及使用物质实力的意图和目的,抱有高度的信任感。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在上述的哪一种格局里,如果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继续保持发展,如果中美之间继续在包括经贸在内的广泛领域保持密切的关系,那么,它们将对未来中美安全政治构成重要的影响因素。一方面,中国经济力量的强大和社会稳定,将促进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从而对该地区的实力分配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带来一定的变化。另一方面,中美之间在诸多领域日益深入的相互依赖程度,有可能成为推动两国之间社会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并成为稳定未来两国之间安全政治关系的主要支柱。本文认为,后一个方面里的中美之间社会关系的变化,将直接影响着前一个方面里的中美之间物质关系变化的含义。

四、未来最有可能是哪种格局？

未来的亚太地区国际体系最有可能处于哪种格局呢？或者说，在这五种格局中，未来中美安全政治关系最有可能处于或接近于哪种格局？

如前所述，就中美安全政治关系而言，中美结成战略联盟的格局是一种最为理想的情形。不过，出现这种格局的可能性也最小。国际关系历史告诉人们，在不存在共同敌人的情况下，两个大国结成联盟的情形是罕见的。所有结盟的动机是由于面临明确共同外来威胁者（包括来自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威胁）。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不会在亚太地区共同面临一个单独难以对付的敌对国家。在没有明确的外来威胁情形下，中美两个大国结成联盟的动力是微弱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当然，未来（甚至是现在）中美两国的共同威胁包括疾病、毒品、环境污染、国际恐怖主义、全球金融危机、能源短缺等等，但它们不足以使两个大国结成传统意义上的联盟关系。此外，新中国外交在原则上奉行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不称霸的政策。

安全共同体也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格局，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亚太地区出现这种格局的可能性也不大。由于该地区的历史经历，一些国家在边界划分、主权、历史叙述/记忆、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着较深刻的分歧。这类难题给亚洲国家之间实现在观念、价值、知识、信念以及话语方面的更多分享构成了障碍。此外，如果美国继续充当超级大国，那么，战后以来它在亚太地区所一直推行的以双边关系而不是多边关系为主的政策，会严重妨碍安全共同体在该地区的出现。不过，一种较为乐观的情形是，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增加，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有可能使该地区在安全政治领域的相互依赖增多。尽管如此，亚太地区实现安全共同体仍然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权力平衡的格局——或者说类似于“多极”的格局——是令人期待的。但是，它取决于若干条件。一是美国是否会衰败下去。尽管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有关美国盛衰的辩论从未间断过，但是，从目前来看，美国仍然具有物质上的优势，比亚太地区任何其它国家或权力集团具有更多的军事、经济及文化资源。“9·11”事件后，美国在“反恐战争”中开始暴露出它在这些资源方面的弱点。尽管如此，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在可遇见的未来仍然会维持着，除非美国自己决定放弃它的超级大国地位。另一个条件是美国衰败后，没有其它国家愿意替代美国充当新的超级大国。只要存在着超级大国，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平衡格局就难以出现。

重新出现两极格局的可能性存在着。但是，有人观察到，从历史上看，超级大国的数目呈逐渐递减而不是递增的趋势，从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叶有若干个超级大国，到冷战时期留下两个超级大国，到冷战结束后只剩下一个超级大国^[4]。从实际的方面看，即使中国在一些人眼里是一个主要的超级大国候选者，但问题是，中国是否愿意做一个超级大国，或者说，中国是否更愿意做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从目前来看，中国的利益与现存的国际秩序关系太密切了，更宁愿致力于建构一种平等、和谐的国际社会，而且，中国也从未给自己“设计过建立地区或全球霸权的理论和战略”^[5-p157]。

在未来的20-30年里，亚太地区国际体系最有可能的格局将类似于目前的霸权格局。冷战后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竭力谋求维持一种与本国核心价值及利益相一致的地区和全球秩序。在亚太地区，它谨慎地防止出现任何国家或权力集团对美国的霸权构成挑战，以便使这种物质实力分配上的不平衡在该地区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下去。有研究者认为，从近期看，美国的“力量不可能下降，它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也不太可能发生改变”^[6]。如前所述，战后美国亚洲安全政策的一个

譬如，它拥有世界上最为现代化的军事技术和实力，但在伊拉克却屡屡受挫，无法结束它在那里发动的战争；它被认为是世界经济中的头号强国，但是在伊拉克重建方面却没有启动类似于二战后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项目；它在全球范围内倡导民主和自由，但是入侵伊拉克战争使它在国际道德及伦理方面丧失威信。

明显特征是,鼓励国家之间关系的双边安排而不是多边共同努力。譬如,美国与它在亚洲的追随者之间建立双边同盟关系,谨慎地确保这些盟友在实力方面不会超过美国,同时利用这类同盟关系防止和遏制其它国家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

然而,这种霸权治理是不完备的。尽管亚太地区尚无哪个国家或权力集团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或政治意愿去动摇这种霸权秩序,但是,这种秩序不是静止不变的。首先,该地区其它国家的崛起会相对削弱美国的部分实力。第二,这些崛起国家可能不会无限期地容忍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地位,而会通过一定的言论和行动,表达出通过多边努力,而不是通过个别国家的霸权方式对该地区安全政治进行安排的意愿。因此,该地区大国的重新崛起“似乎不利于这种霸权秩序”^[17-p283]。第三,亚太地区是当代国际政治的一个主要场所,美国在亚太安全战略方面“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18-p162],而这些挑战从目前来看美国难以单独应付,而是需要利用甚至邀请该地区其它有关大国力量或权力集团的参与。因此,一种纯意义上的美国霸权治理是不存在的,它在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显。

综上所述,本文利用国际体系研究中的物质和文化的视角,把未来中美安全政治关系放在五种可能的亚太地区国际体系格局里加以理解。首先,亚太地区的国际体系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的建构。本文认为,在想象的五种格局里,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物质实力和它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均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就未来中美安全政治关系走向而言,最理想的格局是中美结成战略联盟关系,最不理想的情形是两极格局在该地区再度出现,中美彼此处于两极的对立面。处于这两种格局之间的诸格局,则为中美安全政治关系发展提供程度不同的竞争及合作环境。

其次,在把未来中美安全政治关系走向放在五种可能的格局里加以理解时,本文把物质实力和社会身份作为分析变量置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冷战结束后,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它们的物质实力和社会身份均处于不断的变化中,这是造成它们之间安全政治关系在当今经常呈现不确定性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这类变化还在继续进行着,因此,两国安全政治关系的不确定性也会相应地持续下去。

如果说所有大国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是朋友式的、竞争对手式的和敌人式的,那么,在未来可能的五种格局里,中美安全政治之间社会关系的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双方彼此如何看待对方的身份变化,并由此影响双方如何看待对方物质实力的变化。如果双方彼此分享和接纳对方身份,形成一种集体的身份感,那么,两国关系将会朝着朋友型的方向变化。如果双方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的身份上存在着差异,那么,彼此可能会把对方的政治及意识形态身份,视为对自己意识形态/政治体制身份生存的一种威胁,从而形成竞争的甚至敌对的关系。从目前的发展看,未来的中美两国所分享的价值、观念和知识将会不断扩大。本文写作之际,美国布什政府在“9·11”事件五周年前夕,明确地把“伊斯兰法西斯主义”(一个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强烈反应的词语)作为美国安全战略上的主要敌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更宁愿联合其它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力量去对付它所确立的“主要敌人”,而不太愿意再去建构一个大国威胁,并将它确立为另一个“主要敌人”。

第三,未来亚太地区国际体系的格局,很有可能是一种非常接近于目前人们所看到的超级大国霸权格局,但是,这种霸权治理又是不完备的,因为该地区其它大国的发展和变化,必然造成美国超级大国力量的相对削弱,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种霸权格局所带来的影响。如果中美两国保持各自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根本不变,那么,它们在身份上的这种差异将使得两国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为

有人认为,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并没有遵循历史上其它霸权方式,而是采取了仁慈的、带有“明显国家风格”的做法,见 G.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Imperi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Search for Regional Stability”. in G.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 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7 - 8.

竞争性的,甚至是敌对性的。但是,如果两国在其它领域能够增加更多分享的价值、观念和知识(譬如,对付共同的全球性难题、在全球安全战略目标上达成共识等),那么,它将有助于淡化两国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使其从竞争性关系向朋友的关系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物质实力有可能部分地转变成为共同对付全球性难题或实现共同战略目标所需的集体资源。

[参 考 文 献]

- [1] Mearsheimer, John.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4(1990): 5 - 56; Waltz, Kenneth.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1(2000): 5 - 41.
- [2] Gilpin, Rober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 [3] 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4] Buzan, Barr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Lit., 2004.
- [5] 郭万超. 中国崛起:一个东方大国的成长之道[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4.
- [6] Wang, Jisi. "China's Search for Stability with America. " *Foreign Affairs* 84.5(2005):40.
- [7] 杨洁勉. 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外交政策比较[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8] 吴心伯. 太平洋上不太平: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Capabilities and Identities: A Likely Future of China-U. S. Security Relationship

LIU Yong-tao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A possible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security relations between two states is to put the two states into certain systemic levels for exploration, on the ground that this exploration may disclose, in a broad sense, their relations in the politics of security. Using a mixed material-cultural approach, this article imagines five possible scenarios that may emerg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Asia-Pacific region, in which future China-U. S. security relations are understood. It argues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possess in those scenarios different social identities, which may, in turn, determine how they see the meaning of each other's changing material capabilities, so as to make their security relations tainted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China-U. S. security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ystem, material capability; social identity

[责任编辑 王 群]